

金文兵 著

颠覆的喜剧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转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颠覆的喜剧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转型研究

金文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颠覆的喜剧: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小说转型研究/金文兵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04-4177-0

I. 颠… II. 金…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1980~1990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014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师若夫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丁 帆

追问与探询

——《颠覆的喜剧》序言

金文兵博士毕业已经两年了，说实话，我以为他对学业上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淡化，甚至停顿了，也就没有太在意他最近研究工作的动态。然而，当他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的反复修改稿寄给我的时候，我的确是惊讶了一回。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就连一贯以清静为本的学术界也难逃其厄运，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一大群的“现代”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这种新世纪的学术时髦病。如何克服做学问上的致命弊病，成为学术界“是生还是死”的大问题。然而，我在过去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金文兵们这里却看到一线希望，他执著的治学精神也就成为我对新一代学人刮目相看的新起点。

文兵在校攻博时，曾一度 and 同门的几个师兄弟痴迷于哲学问题的探讨，他们对黑格尔、尼采、叔本华、阿多诺、海德格尔、马克思·舍勒、巴赫金、米兰·昆德拉等人提出的哲学与美学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与辩论，其中所涉及的许多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问题讨论之深是令人惊叹的，乃至其中一位仁兄居然为了啃透黑格尔而去学习德文、而去购买了全套的德文版

《黑格尔全集》。这就使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刻苦的思辨精神和坚韧的学术毅力。

比起最初的毕业论文，此稿的修订可以明显地看到文兵随着对此论域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其论证的理路愈来愈清晰了，其思考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也非同日而语了。体系化、理性化、逻辑化的特征亦愈来愈凸显。

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此稿，我感觉到文兵是想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来一个体系化的重构。将 80 年代到 90 年代转型期的小说创作固定在价值理念和审美诉求的八个方面，其本身就充满着理论的思辨色彩与挑战性，它是否真正抓住了其本质特征了呢？就我的目力所至，窃以为，起码在大部分的论证结穴上是切中要害的。“论文共由小说的历史与真实、价值颠覆的发生、女性话语的建立逻辑、身体的归属性问题、儿子时代的喜剧性父子伦理关系、人在驯顺命运中所剩下的最后可能性、家园丧失的现代意义以及 1990 年代小说的喜剧性精神品格这八个部分组成”。除了个别问题有内涵与外延的交叉外，这些问题的确是那一历史时段凸显出的带有哲学思辨意味的文学命题。

但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怎样才能完成体系性的理论构建呢？于是，文兵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的三种界定方式”：“‘陌化之人’从‘奋求者’当中界划出来（第一种界划方式）；身体的自我从精神的自我、女性话语从男性话语、儿子从父亲权威中界划出来（第二种界划方式）；自我从家园、自我从规训中界划出来（第三种界划方式）。与此相呼应的是，还对审美认知方式上的两次革命进行了讨论：历史与真实认知的可能，以及严正与喜剧的风格变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判断并非只建立在对 1980—1990 年代文学现象的孤立性考察上。如何把一些看上去很新的问题，融合进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作

出应有的追问与探询，也是本文努力的一个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能够获得认识上的与论述上的历史感和完整性。”我对于文兵的这种“人的三种界定方式”还不能全部认同，但是作为对一种问题的言说方式，我以为论者寻觅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此来归类、剖析 1980—1990 年代的小说文本，就有了一番别出的新意。

在确定其三种界划模态方式后，最重要的就是论者的价值判断的文化批判精神的体现。因此，以人性为价值定位的坐标，就成为文兵探询问题的隐含价值理念标准。缘此，我以为此书在文化批判的指向上就有了清晰的逻辑理路，其文化哲学批判的锋芒便使其更具有思想的尖锐性。

我以为金文兵在这部专著里也绝非仅仅是迷恋在哲学的迷宫之中而不可自拔，他在大量的典型文本的细读当中，显示出了对文学作品与众不同的独特体悟，虽然它们还带有那种哲理意蕴的经验性痕迹，但是，这种独到的见解往往是一般平庸的评论家们所不能企及的，这种体验的获得是依靠作者长期对其哲学观照的美学对象——文学作品的理性穿透而生成的。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文兵对出现在 80 年代后的作家作品有着一种近乎刻骨铭心的哲理性解剖，尤其是对像张洁、张辛欣、王安忆、陈染、林白等那样的女性作家们的文本；对像贾平凹、莫言、刘震云、张炜等那样的“还乡者”们的文本；对像王朔、余华、朱文等那样的“儿子时代的伦理喜剧”的制造者们的文本；对像王小波等那样的“突破规训命运”的特例者的文本，文兵都作出了精辟而别样的分析。我这里所说的精辟，就是指论者以其哲思的独特视角；所说的别样就是对文本中的许多现象进行了与一般评论者不同的，乃至相异的价值评判，其中许多惊人的价值理念就是通过对文本不同凡响的经验性

解读而获得的。就此而言，我看到了另一种由理性到感性，再上升到理性的文本解读方式的可行性与实践价值。

我以为怀疑一切，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可能是推动人文学科永远前进的原动力，没有这种学术的精神与胆识，是难成气候的。而表面上文质彬彬的金文兵，骨子里却透着一股犀利的锐气，亦如他在本文最后的论述中而言：“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被给定的规范与秩序的怀疑，严肃地讲述和讨论一个问题是基于对一种肯定判断之后所持的立场——真理的维护；但并不等于它就是惟一的终极的判断，而且它只构成传统的积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层面或阶段。”不断否定前人、否定传统、否定一切现成的理论和体系，甚至否定自己，才有可能在学术上有所长进，有所建树。否则，重复前人的东西，只能拿别人的理论当作自己的武器的所谓“学者”，是永远匍匐在别人阴影下的精神侏儒。从这里，我看到了希望，尽管金文兵有的观点还不够成熟，尽管他对前人大师的理论世界还有迷信与迷狂之处，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成长”着的青年智识者！他们才是学术的未来，他们才是思想的未来。

当然，我也十分欣赏作者在此书最后引用尼采在其《论道德的谱系》中的那段话：“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人类的巨大危险、人类最精致的迷惑和引诱——人类将被引向何处？走向虚无？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末世的来临，看到了停滞、回顾往事的疲倦、反抗生活的意志，看到了关于临终疾病的温柔而忧伤的兆示。这种越来越流行的同情道德甚至传染、弄病了哲学家，我把这种道德理解为我们业已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的病兆，一种通向新佛教、通向欧洲人的佛教、通向虚无主义的弯路？”始于忧患，才有可能创新；只有怀疑，才有可能突破！紧迫感才能使学者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逶迤的学术道路上，我们应该看好这种学术姿

态，看好那种勇于攀登悬崖峭壁的人！

我希望文兵能够永远保持这种旺盛的学术姿态，永不凋谢，永不枯萎。

是为序。

目 录

追问与探询

——《颠覆的喜剧》序言 丁 帆 (1)

导论..... (1)

人的三种界划方式：“陌化之人”从“奋
求者”当中界划出来（第一种界划方式）；身
体的自我从精神的自我、女性话语从男性话
语、儿子从父亲权威中界划出来（第二种界划
方式）；自我从家园（原乡文化）、自我从规训
生活中界划出来（第三种界划方式）/ 认知方
式上的两次革命：历史与真实；严正性与喜剧
化

第一章 小说的历史与小说的真实

——关于小说及其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讨论 (13)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小说的命名真相
/ 小说与现实主义之间与生俱来的关系 / 小说与
真实认知——建构一个更接近真实本质的认知

世界/小说对人的认知——文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于人的情状的表述权利

第二章 被承认的生活

——陌化之人从自然人中界划出来 (39)

从理想主义写作到日常生活写作——关于存在的被遗忘问题/价值颠覆的发生——从新写实小说看陌化时代的来临及由充满怨恨心理的市民所组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陌化之人”与“奋求者”——“价值攀比”现象下的“位置”及天命、天职思想的动摇/来自道德理想国的思考

第三章 属己的身体与历史的真相 (67)

古典伦理范式——精神上自我对肉体上自我的凌驾/爱情神话的颠覆——爱与怨恨的心理结构/身体的归属性与道德归罪——《黄金时代》：道德归罪的可疑性以及作为个体羞感或罪感的发生问题/历史的反思与真相——《叔叔的故事》：两代人关于历史的不同讲述方式

第四章 女性话语的建立逻辑

——女性话语从男性话语中界划出去的可能 (95)

男性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溃败与男性文学内部所出现的一种边缘化的独语性迹象/《方舟》：“性沟”问题的出现及女性命运与女性社

会定位/《弟兄们》：女伴乌托邦的解体/《私人生活》：作为“她们”的“我们”在一系列互相协作的“我”中产生/母与女：逃离男性的同时作为同盟的母亲也成为需要逃离的对象/女性文学的历史轨迹

第五章 儿子时代的伦理喜剧…………… (121)

美学法则与伦理法则中的父子关系/《在细雨中呼喊》：对成人世界的指控/《许三观卖血记》：瓦解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伦理观/《我爱美元》：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儿子时代的喜剧性象征：自由而没有顾忌的游戏与玩乐——兼及“新生代”作家的集体肖像与“粗鄙化”创作倾向

第六章 故乡何谓

——家园的丧失与衰落的母亲…………… (146)

“寻根”及“还乡”小说的暧昧文化立场/鲁迅与家园丧失的现代性意义/《高老庄》与《心灵史》：在对另一种种族文化的寻找与认同过程当中进行反思/莫言与刘震云：对于故乡的背弃与对于母亲的呵护立场/“摩罗”式勇力与嬉笑怒骂的叛逆本色：从张炜、贾平凹陷入文化怪圈看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的文化价值趋向

第七章 规训命运中人的可能性…………… (174)

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及其关于人的困境的描述/以小说的方式把乐趣从机械板滞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遭遇规训与“驯顺的”肉体/理性的丧失与存在的被遗忘

第八章 小说的喜剧性意义

——20 世纪中国文学从严正悲苦转向喜剧

性反讽的理论背景…………… (192)

“诗可以怨”：关于传统中悲剧比喜剧伟大从而压低“欢愉之词”的事实/“雅正为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悲剧与喜剧选择/进入“反讽的”模式阶段：从讽刺文体的演变与弗莱的原型理论看“庄严的同情”的消失/喜剧的再生：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看 1990 年代小说的喜剧精神/结语：藐视同情

主要参考书目…………… (228)

后记…………… (234)

导 论

中国当代文学从 1980 年代进入 1990 年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转型事实，已经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与基本认可^①。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正是关于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小说发生在价值理念和审美诉求方面的根本性转变。论文共由小说的历史与真实、价值颠覆的发生、女性话语的建立逻辑、身体的归属性问题、儿子时代的喜剧性父子伦理关系、人在驯顺命运中所剩下的最后可能性、家园丧失的现代性意义以及 1990 年代小说的喜剧性精神品格这八个部分组成。

这八个部分的有机性体现在对转型期间文学的一种整体判断上。大致可以描述为，人的三种界定方式：“陌化之人”从“奋求者”当中界划出来（第一种界划方式）；身体的自我从精神的自我、女性话语从男性话语、儿子从父亲权威中界划出来（第二种界划方式）；自我从家园、自我从规训中界划出来（第三种界划方式）。与此相呼应的是，还对审美认知方式上的两次革命进行了讨论：历史与真实的认知可能，以及严正与喜剧的风格变

^① 参见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 年第 4 期；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 年第 3 期；张颐武《论“后乌托邦”话语——199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向》，《文艺争鸣》1993 年第 2 期；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文学自由谈》1994 年第 3 期等。

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判断并非只建立在对 1980—1990 年代文学现象的孤立性考察上。如何把一些看上去很新的问题，融合进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作出应有的追问与探询，也是本文努力的一个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能够获得认识上的与论述上的历史感和完整性。

在进入具体的讨论之前，很有必要对本文中的“1980 年代”与“1990 年代”这两个概念作出一定的界定。首先，它们的命名均源自一种学界的约定俗成，出于表述上的方便考虑，不妨沿袭旧说。其次，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所以在涉及 1990 年代文学命题的讨论过程中也会涉及 1980 年代后期的文学作品。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在本文中之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时间弹性，这和文学发生变革时期的过渡现象有关。但它们分别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与精神理路，是本文试图论述的重点。

在分期上，本文倾向把新写实小说作为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文学的精神分界线。因为以还原生活本来样式为写作意旨的新写实小说，体现了从历史的理想主义写作向日常的世俗生活写作的转折方向。它的意义在于解构了乌托邦时代的宏大叙事，在对日常生活的体认中敞现了被海德格尔所命名的“存在的被遗忘”^①问题。所谓“存在的被遗忘”问题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就在于一个精神力量或历史意志过于强大的时代里出现了新的生活趣味与审美维度。新写实小说还原生活的态度体现在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被历史理想主义话语所遮蔽的或悬置的生活样式。

^①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 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意味着日常性叙事过程所表现的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被承认的生活理念。它把生活还原到一种最基本的形态,使得1990年代小说关于爱的秩序、女性话语、父子伦理、故乡何谓以及人所剩下的可能性等问题的讨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问题的敞现与重构提供了可能性。所有这些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已经出现。基于上述考虑,所以把日常生活性写作对于历史性写作的解构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理念颠覆现象,作为本文的第二章“被承认的生活”部分着重讨论的主题。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那就是一个有着几千年道德传统的社会秩序为什么会突然在1980—1990年代出现一次巨大的价值体系雪崩现象?

“属己的身体与历史的真相”作为本文的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两性关系交流的身体性与精神性的问题。新时期小说在对两性爱情的定位上,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等作品为代表,注重表现的是爱的精神性力量,从而唤起人们对一种精神位格的关注。与下一章我们将要讨论的父子伦理问题一样,新时期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之后对传统道德伦理进行修复的时期,在对于爱的秩序的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随着对日常生活的日益关注,被爱的神圣性光环所掩饰的东西被揭示出来,如构成爱的秩序的物质基础以及身体性诉求等问题。新写实小说中“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主张,如果说还原了两性关系建立的物质基础,把一直悬置的精神生活拉回世俗层面,那么1990年代小说则在还原后的这块空地上对两性交流的精神性与身体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在对两性身体性交流的困境的讨论中,使问题变得富有阐释的价值。究其实,问题的本质就体现在对一种道德伦理范式的追问:把精神上的自我完全凌驾于肉身的自我之上的做法是否必要?

这显然是1990年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的意义还在于把人从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依赖或历史意愿的盲目信从当中救赎出来。王小波的《黄金岁月》在对自我清白无辜的证明过程中所显示的荒谬里，讨论了道德归罪的可疑性以及作为个体羞感或罪感的发生问题，从而让“属己的身体”问题回到了从充满机械规训的道德价值观念摆脱出来的现代语境当中。这意味着“身体的归属感”问题不单纯在两性关系中得以表现出来，也突出体现在对个体的精神考察方式上。

同样是对一段历史的反思，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叙事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张贤亮的那种悔罪式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为个案，它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之间的精神分野就在于，前者的归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历史的理性意愿的体现，而后的罪感则是属己的个体的感受。前者貌似以自审的方式进行反思，实质代表的还是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以，张贤亮始终是一个跪着的赎罪者，表述的是：我有罪。与之相反，王小波则是试图通过喜剧颠覆的方式追问：何罪之有？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表明，我们探讨身体的归属感意义就在于进入1990年代以后，一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个体精神史书写模式的产生。

“女性话语的建立逻辑”是第四章中主要讨论的题旨，它首先和男性话语的走向虚弱不无关系。随着男性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政治的和人文的双重意义上）的溃败，一种以承担社会历史的宏大性叙事为己责的自信力严重受挫，从而在男性文学的创作内部出现了一种边缘化的独语性的迹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一次更趋文人化或文人趣味化的重新定位。失去了宏大叙事支撑的文学，意味着与男性气质一体的大气与强悍风格的消失。由此，阴柔化成为文学创作中一种普遍的倾向。这为女性话

语的确立留下得天独厚的空间。马克斯·舍勒以为：“女人是真正的生命天才；而与女人相比较，男人堪称精神天才。”^① 因为“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②。所以，在人（男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的时代里，女性特有的生命感受天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和1980年代以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起跑线上》等为代表的这种突出性别意识的文本不同的是，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凯旋并不完全是以对女性命运的抗争和重新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而引人瞩目的。在男性话语基本放弃咄咄逼人之势的并不强悍的话语时代里，女性在充分享受着自我生命感悟的同时，并没有以性别统治者、专制者的野心或面目出现。相反的是，她们只想经营好自己的女人或女性王国，在表达对于女性自我身体与生命的体悟之中，构建纯粹母系世界的母女关系。这其中有如下几点值得澄清：一、女性自我身体的觉醒与展示；二、女性自我身体的欲望暴露与女性自我王国的封闭——一种在同性之内拒绝男性访问或介入式的封闭；三、母性。在第一点上，女性自我的身体觉醒与展示应该和男性视角的欣赏相区别开来。这意味着女性不再扮演从属性的被欣赏者角色，从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来自男性观看或男性想象的身体叙事。而在第二点上，就已经属于西方女权主义的主张范畴，把女性世界和男性世界完全对立甚至对抗起来。如果说这种对立甚至对抗还有什么和解的可能性，那就是母性的存在。在王安忆的《弟兄们》中，女

①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第2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第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